

明治学院的戰爭責任・戰後責任告白

主，適逢日本國敗戰五十周年之際，我首先要向您告白明治學院參加那場戰爭的罪行，向朝鮮、中國及其他各國人民賠罪。同時，還要對戰後一直未能將此罪過昭示於眾進行告白和賠罪。

敗戰五十周年之今日，悲慘戰爭的真相不但未能銷聲匿跡，反而隨着歲月的流逝更為眾人所知。「從軍慰安婦問題」、「七三一部隊」的人體實驗等鐵証如山、戰爭所帶來的痛苦時至今日，仍然折磨着幸存者及其親屬。

日本國民所犯的戰爭罪行顯然殃及各國人民。基於基督之愛精神而創建的明治學院做為日本國的一部分，當然難以從這種行為中逃脫。

就同國家的關係而言，一般來說，私立學校處於弱者的立場。儘管如此，長期以來，光榮地捍衛了「以基督教為教育之本」這一建學精神的明治學院，對於曾經參與那場戰爭所犯罪行，在主耶穌·基督面前是無可回避的事實。

本來，沒有親身體驗過戰爭的我們是沒有資格去非難戰爭年代的負責人的。唯有主能對他們及所屬組織進行斷罪。但是，透過越來越多的戰爭受害者的証言，我們完全可以更加全面地、客觀地去認識那場戰爭。正因為如此，對於當時的負責人們所犯罪行，我們不得不向主告白、向各國人民賠罪。這並不是為了去鞭笞當年的他們，而是為了不使我們重蹈覆轍。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之後，日本政府按照一九三九年的“宗教團體法”，對宗教界進行整頓、於一九四一年六月成立了旨在支持國家政策的“日本基督教團”。該教團「統理」富田滿牧師親自參拜伊勢神宮、並強迫朝鮮半島的基督信徒參拜平壤神社（一九三八年）。這不但迫使眾多的朝鮮基督信徒殉教，給戰後日朝兩國的基督信徒之間也掘下了難以逾越的鴻溝。因為這場神社參拜事件，朝鮮和台灣的許多教會學校陷入學校本身能否繼續生存的窘境。這位富田本人，從戰時到戰後數年期間，一直擔任明治學院的理事長。

此外，一九三九年，就任明治學院院長的矢野貫城，是積極參與宮城遙拜、靖國神社參拜、御真影之奉戴等活動的人物。此人也沒有公開向主告白，戰後一段時間內繼續擔任明治學院院長。對於上述事實，明治學院至今從未向主告白、向受侵略國家的人民賠罪過。在以“飛翔！日本基督教團號”的口號下所進行的戰鬥機募捐活動、或以日本基督教團的名義，在當時的機關報《教團時報》上宣揚“殉國即殉教”、鼓吹基督信徒向天皇制國家的無條件服從的浪潮中，也是富田充当了最高負責人的角色。當時，軍國主義蔓延全日本，即使我們能夠理解最高負責人為保護做為“主之器”的教會組織的一片苦心，上述的戰時所做所為，構成了日本國家犯罪的一部分是無庸置疑的。回想起在當時這種情景下，許多學生被迫做為學徒兵出征參與侵略戰爭，我做為教師和學院長，深感悲痛。同時，對於當時被迫送學生上前線而深夕痛苦的朝鮮、台灣等地的教師們則不勝同情。對於上述諸種事實，起碼在主宣布了“敗戰”這一審判之後，學院的負責人是應該進行告白和賠罪的。

遺憾的是，戰後不但沒有進行反省和賠罪，反而，把從事侵略戰爭的日方戰死者祭為“英靈”的思想在明治學院中也曠日持久，不能消散。

學院理事會是維護明治學院“建學精神”的主體。做為該理事會理事之一的田上稷治、積極地參與了國家權力所推行的參拜“英靈”活動。這是和戰爭期間富田等人所犯的完全相同的罪過——《聖書》中給我們昭示的主最忌諱的、把死者視為神用來進行“偶像崇拜”之罪——在戰後的明治學院也繼承下來的一個證據。

如上所述，“戰爭責任”問題同“戰後責任”的告白密接相關，這個問題不解決，今後的明治學院是沒有發展前途的。

不過，敗戰五十周年的今天，俯首明治學院在戰爭期間的歷史，我們可以從像出現了長谷川信那樣有良識的學生之例看到希望的光芒。長谷川所表現出的被迫出征之苦惱和在“天皇之國”思想的重壓之下仍然追求自我精神獨立的氣概，似給唯以耶穌·基督為支柱的明治學院指明了今後的發展方向。我想，像他那樣為堅持自己的人生哲學而苦惱的學生當時一定不會少。

對於重新確認建學精神、努力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明治學院來說，同富田、矢野等人所走過的“陽關道”相比，學生長谷川所經歷的“獨木橋”正應是我們今後的必走之路。現在，借“國際貢獻”之美名，日本又重新開始向海外派遣起軍隊。“殉國”（為國而殉死）思想以其現代的偽裝一點一點地開始向社會浸透。我們對於殉難者可能再次做為“英靈”進行崇拜不禁危機之念。我們首先通過深刻認識明治學院的戰爭責任·戰後責任，向主告白，向眾人公開，向飽受戰禍摧殘的各國人民賠罪，去豪不猶毅地面對時代，爭取“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的無瑕疵的兒女，保持生命的言語，好像世間的明光永遠照耀在這個時代”（腓立比書二章一五節）。

通過這次向主的告白，同時也是向各國受害人民的賠罪，我們期待明治學院為創造出源自於基督的真的和平能更進一步努力。

主 一九九五年六月

於日本國敗戰五十周年

明治學院 學院長 中山 弘 正